

唐藩镇统治时期(763—907) 幽州城人口数量试探*

张天虹

内容提要:“幽州城”作为唐朝东北边疆幽州镇统治的中心,其人口规模和构成应予以充分重视。对藩镇时期幽州城的人口数字进行估测,需要明确幽州城作为高度军事化的城市,军人及其眷属是城市人口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同时须考虑城内面积和各功能分区所能容纳的其他各类人群的数量。安史之乱以后至唐末动乱以前,幽州城一般有常住人口8万多人。这一时期,幽州的社会经济水平有所恢复,幽州城也进一步成长为唐帝国东北边疆的区域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可以产生一定的人口集聚效应。综合参考上述背景及后世的一些数据,这一估值当在合理范围之内。如果考虑到流动人口,幽州城在唐后期盛时达到甚至超过10万人,也不是没有可能。无论在北京人口史还是在城市发展史上,藩镇时代都不是一个低谷,而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关键词:唐代 藩镇 幽州城 人口

近年来,学界对唐代城市的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视域正从长安、洛阳、扬州等扩展到更多的地方城市。位于唐朝东北边疆的幽州镇,在唐后期的政治军事格局的转换中具有重要位置。幽州城^①作为幽州镇统治的中心,其人口规模和构成是研究藩镇统治下城市社会的基本问题,应予以充分重视。关于唐幽州城人口数量的估测,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开元、天宝年间(713—755)。^②高寿仙的《北京人口史》是近年来对历史上北京地区及城区人口研究的重要成果,^③将唐末五代时期幽州城人口数量估测为不少于5万。^④但对于安史之乱结束以后至唐末(763—907),即藩镇统治时期幽州城的人口数量似未作具体估算。本文将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立足幽州镇统治下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状况,试析安史之乱后至唐末幽州城的人口规模。

一、对已有估测结果和研究方法的思考

对藩镇时期幽州城的人口数字进行估测,天宝年间(742—755)的人口数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

[作者简介] 张天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9,邮箱:jilintianhong@126.com。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刊石刻文献与7—10世纪华北社会经济变迁研究”(批准号:13BZS085)阶段性成果之一。向匿名评审专家以及北京行政学院高寿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正建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史学沙龙第27期“唐代城市史专场”(2014年11月)和第三届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2015年7月)的与会学者致谢。正文中提到的所有学者都省去了“先生”等敬称,见谅。

① 幽州作为行政空间概念,一般有三层含义。狭义的幽州即是指幽州城。参见宁欣、李凤先《试析唐代以幽州为中心地区人口流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本文为强调研究的是城市人口,一般都用幽州城来表述,而用幽州表示刺史辖区、幽州镇表示幽州节度使统辖范围。

② 参见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按:关于各时期北京城市人口的章节是由韩光辉执笔。另可参见高寿仙《北京人口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

③ 赵连稳:《高寿仙〈北京人口史〉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15年第1期。

④ 从高氏的举证来看,其“唐末”似指天祐三年(906)以后。参见高寿仙《北京人口史》,第114—115页。

照。但关于天宝年间幽州城内人口数字,学界尚存在分歧。韩光辉参照了长安城坊的面积和人口规模(方圆4里,每坊400余家,共26坊),推测幽州城在唐天宝年间盛时有居民1万余户,6万余人(每户以5.94口计算);此外,幽州城驻有经略军3万人,并考虑驻军眷属,总人口可达15万。^①韩光辉对于每坊的面积和人口数量的估测基于李峤的《代公主让新起宅表》。^②高寿仙指出,李峤所言之坊,地处要冲,户数可能高于各坊平均数;边陲重镇蓟城(即幽州城)的人口密度应当低于首都长安。假设每坊300户,户均人口5.94口计,则当有4.6万余人。而且屯驻官兵不一定都住在城内,驻军家庭规模可能小于官吏和普通市民,故假设城内驻军和眷属共4万人,则天宝年间幽州城总人口当在9万左右。^③

当我们把上述这两种估算作为估测藩镇时代幽州人口数量的参照之时,在研究方法上还需考虑其他一些问题。

第一,上述两种估值,都是以长安城的坊人口密度为参照,经过不同“折扣”估算出的结果。据王社教研究,唐后期长安外郭城每坊的人口密度差距极大。剔除东市、西市、曲江和兴庆宫(原兴庆坊)之后,人口密度最小的坊每平方千米201人,人口密度最大的坊每平方千米竟然达到35000多人,平均也达到每平方千米约9915人。从绝对数字来看,每坊最多达30000人,最少仅100人,平均每坊达5419人,而众数则是7200人。长安外郭城内存在各种场所,至少有寺院、国子监、训练场、各级官员住宅的占地,因此,每坊的人口密度变化很大。^④与中晚唐的其他地方城市一样,幽州城应该由节度使所在的子城(或称牙城)和一般军民居住的罗城组成。外罗城中还有县廨、寺观、兵营、市场和官民住宅等,如果以坊均人口进行推算的话,其各坊人口平均密度应该如何参照长安城内各坊人口密度,需要重新评估。

第二,唐幽州城的坊数,需要再研究,“二十六坊”之说尚待进一步证实。宿白认为,唐代建城具有等级制度,幽州被归类于“唐州府城中最大的一种”,罗城当有16个坊的面积(每个坊以0.5平方千米计)。^⑤事实上,地方城市等级和规模未必皆合这个制度,^⑥中晚唐时期,像幽州城这类强藩统治的中心,可能也不会太多受到这些等级制度的限制。鲁琪、鲁晓帆等学者先后考订了幽州城坊,^⑦且以《乘辂录》中的记载作为根据:“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有鬲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⑧他们据此作了一个潜在假设,辽南京坊名就是唐幽州坊名的沿袭。在此之外,似乎并无其他传世文献佐证。陈康曾指出,有些见于辽代墓志的坊名没有见于唐代墓志,^⑨也未见于《房山石经题记》等其他碑刻文献。显然,这是一个需要更多出土文献来验证的问题。笔者也发现唐代墓志中所

① 参见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第252页。近年来,韩光辉仍坚持这一看法,认为幽州城坊与长安城坊规模相埒,参见《从幽燕都会到中华国都:北京城市嬗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5页。

② 参见[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578,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987页。

③ 参见高寿仙《北京人口史》,第112页。

④ 参见王社教《论唐都长安人口的数量》,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116页。这些数值均据王社教的估值计算得出。

⑤ 《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285页。

⑥ 李孝聪已根据新资料的发现提出,这种理想化的推论需要修正。参见《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李孝聪主编:《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

⑦ 鲁琪:《唐幽州城考》,北京史研究会编印:《北京史论文集》第2辑,1982年印行,第107—123页;鲁晓帆:《唐幽州诸坊考》,《北京文博》2005年第2期。

⑧ [宋]路振:《乘辂录》,《丛书集成初编》第31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页。又贾敬颜《〈乘辂录〉疏证稿》录文与此略同(个别文字有出入),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今从《丛书集成初编》本。

⑨ 《唐代幽州蓟城里坊、村乡之我见》,《北京文博》2006年第1期。

记载的一个坊名“礼客”,未见于前述学者的论著。^①未知唐幽州城的坊名是否前后有变化,所以,在坊数难于考订之前,以坊为单位进行估算存在诸多风险。即便使用这种方法,也应该考虑再辅以其他方法来进行验证。

第三,城内驻军问题应该重视。高寿仙认为幽州城屯驻官兵不一定都住在城内。然而《旧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经略军“在幽州城内,管军三万人,马五千四百匹”。^②且据《蓟门纪乱》描述,幽州城内有“经略军南街”,^③当与经略军驻地有关。^④经略军在安史之乱以后沿置。李怀仙、朱希彩任幽州卢龙节度使时(763—772),朱泚任经略副使。史载“泚营在城北”,^⑤则知经略军营地在唐幽州城内部。而藩镇时代的幽州子城内尚驻有节度使的衙兵,其数量也需要进行评估。

第四,藩镇统治时期幽州城市人口数量是否是北京城市人口史上的一个低谷?高寿仙判断“北京城市的人口数量,战国盛期作为诸侯国都城时可能达到15万,但秦代以降一般也就三五万人。辽代升为陪都后,城市人口数量达到16万”。^⑥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层面:一是中晚唐幽州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状况怎样?于璞将唐天宝年间与辽初幽州人口数字做了一个对比,得出结论:“北京地区的人口减少过程中以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以及契丹的内侵带来的影响最大。”^⑦藩镇“割据”几乎贯穿中晚唐近150年。于氏所举史料最早的一条是902年,实际上已是唐末。藩镇“割据”是否对幽州社会经济造成了较大破坏,仍然需要进行评估;二是藩镇统治下的幽州城属于何种性质的城市,在幽州镇的城市格局中处于何种地位,是否能够产生人口集聚的效应?分析这些问题,将非常有助于我们对其城市人口数量做出更为合理的判断。

第五,藩镇统治时期幽州城市流动人口状况如何?一般认为,安史乱中及其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避乱,幽州人口亦大量迁出。吴松弟曾广泛搜集资料,整理出中晚唐五代时期北方移民的事例。^⑧在此基础上,高寿仙进一步整理了幽州迁出人口的事例,^⑨并指出唐末五代幽州人口往往被契丹俘掠出境。^⑩但事实上幽州和中原及南方地区的人口流动,从来不是单向的,大量人口流入契丹亦是唐末之事,所以,对藩镇统治时期幽州人口流动状况也需要进行评估。

二、对本文研究方法的说明

由于资料稀缺而零散,学界对唐代城市人口数量的估算主观性很强,得出结果自然相差很大。这集中体现于对长安人口总数的估算,大约从50万—180万不等。^⑪这些估测结果基本是通过两种方法来完成:一种是按人群统计法,通常将某一城市人口分为几类人群,然后分别进行统计。严耕望

① 参见《唐故朱府君(愿)墓志铭》,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这方墓志记载,志主朱愿,建中四年(783)二月卒于“范阳府礼客里之私第”。建中三年,四镇之乱时,幽州节度使朱滔“以幽州为范阳府”,参见《旧唐书》卷141《田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45页。学者们发现的唐代幽州城坊名有时是以“里”出现,按学术界大多数意见,可以看作是“坊”的别称。

② 《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第1387页。

③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三月条胡注引《蓟门纪乱》,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112页。

④ 村井恭子则据《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题记,进一步推测天宝年间的“范阳郡军南门”应在“经略军南门”附近。参见[日]村井恭子《唐代边境防卫城市幽州》,杨振红、[日]井上御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⑤ 《旧唐书》卷200下《朱泚传》,第5385页。

⑥ 《北京人口史》,第491页。

⑦ 宋大川主编:《北京考古史·辽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⑧ 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以下简称“吴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347页。

⑨ 参见《北京人口史》,第132—133页表2—12,但表中有两人(侯高、狗儿)系从易州(上谷)迁出,不自幽州(此乃吴氏之误);同时似又脱漏“权皋”和“权皋母”等人。参见吴著,第297—299页表9—3。

⑩ 参见《北京人口史》,第133页。

⑪ 参见张天虹《再论唐代长安的人口数量估算问题——兼评近15年来有关唐长安人口研究》,《唐都学刊》2008年第3期。

使用这种方法估测唐长安的人口数量达到180万。^①该方法充分考虑到了城市社会的各个群体,比较全面具体,但是也容易导致统计过程中的重复计算。另一种或可暂且称为“以人属地”法,即对城市(以长安为例)内部的空间布局和相应的人口密度进行考察,分别计算各个空间所能容纳的最大规模的人口,最后加以汇总。^②其优点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按人群统计所造成的重复或遗漏,同时从人类活动所需要的必要空间入手进行估测,增加了约束条件,从而尽可能避免得出违背常识的结论。^③而且,就难于量化的古代经济史而言,“空间已经成为经济方面表达数量的一个重要方法”。^④但对于人口史研究而言,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空间的计算,尤其在没有精确的考古信息的情况下,有时存在一些误差,而且封闭的空间往往会限制我们思考的维度,如对于流动人口几乎没有任何考虑。宁欣指出对长安人口数量估测差距较大的原因在于:对长安人口的核定范围不统一,对于人口结构的理解不同,对在籍每户平均口数的推算不一,对脱籍人口的推算不一,以及户籍人口是否计算和如何计算,存在差异;而对于流动人口界定不清,甚至根本没有计算在内。她特别强调对于流动人口数量及其构成的估测。^⑤显然,这些意见对于唐代其他城市人口数量的估算,都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鉴于学界对城市人口数量估测的现状和前文所总结的5个问题,本文将首先考虑特定背景下幽州城的城市性质,确定城市的主要人群。幽州城作为唐朝东北方向的军事重镇,在安史之乱以后,其军事职能进一步加强。学界通常认为,藩镇时代,幽州不但是下辖9个支州的藩镇的首州,而且城中有幽州和卢龙两个节度使府,^⑥是高度军事化的城市。^⑦“高度军事化”是藩镇时代幽州城的最典型特征,从而也构成了估测其城内人口的基本背景。因此,估算城内的驻军,并由此推算相应的军事人口数量,是顺理成章的。尽管利用兵力来回推人口的做法,尚存在争论,但也有学者认为,在资料奇缺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尝试。^⑧本文使用这种方法,前提是对唐藩镇时期幽州城市性质的判断:高度军事化的城市。因此,军人及其眷属应该是其人口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估算其他人群的数量。

其次,本文不采取以坊为单位的估测法,而是考虑城内面积和功能分区,增加约束条件之后进行估算。在经济学的计算中,增加约束条件,是减少“解”的数量的有效方法,也不失为逼近事实的可行路径。所以,对历史上的人口尤其是像特定区域(城市)人口数量的估测,必须要考虑地理范围、当时的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诸多条件,才可能得出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人口数量。这种方法至少可能比单一估值法要科学一点。因此,本文实际上将使用多种方法来对藩镇统治下的幽州城人口数量进行蠡测,同时还要把得出的结果与同时期其他城市的人口数据以及后世北京城市人口的一些数据进行比较,从而尽力避免得出违背常识的结论。

① 《唐代长安人口数量之估测》,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95年版,第1—20页。

② 参见黄正建《书评:〈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8页;王社教《论唐都长安人口的数量》,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第88—116页。

③ 最近,梁建国分析北宋东京人口分布和空间问题,亦是采取了与此近似的方法。参见《北宋东京的人口分布与空间利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

④ 伍丹戈:《定量分析法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

⑤ 参见《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举选人群体——唐代长安流动人口试析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⑥ 王永兴推测幽州节度使府在牙城之南,卢龙节度使府在牙城之北,参见《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页;冯金忠《唐代幽州镇组织体制探微》,《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⑦ 村井恭子:《唐代边境防卫城市幽州》,杨振红、井上彻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第148—177页。

⑧ 参见高寿仙《北京人口史》,第57—58页。

三、唐藩镇统治时期幽州城的主要人群及其数量蠡测

军人及其家属是幽州城的基本人群。此外,还应有商人(坐贾)、僧尼道士等群体。对这三者的分析是相互关联的。

(一)以幽州军队规模回推军事参与人口数量

某一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从军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被有些学者称为军事参与率(Military Participation Ratio)。^①如果能知道或估算出这个比率和军人的数量,则可以回推支撑这一规模的军事人口数量,然后再根据其他条件进行修正。

首先来看一下藩镇时代的幽州城屯驻了多少军队。前文已经考证,经略军营地在唐幽州城内北部。刘怦、刘济父子曾以幽州卢龙节度使兼任经略军使(贞元、元和年间,约785—810)。^②幽州节度使张允伸时代(850—872),仍有经略军的史料,如任君裕曾“知经略军使”。^③总之,经略军显然长期存在。而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幽州复有纳降军、安塞军,防御军。^④此三军不见于《旧唐书·地理志》,始置时间不详,但很可能均系安史之乱后新置。纳降军驻地,史载不详,冯金忠据《阎好问墓志》,认为此军位于幽州(北部)极边,而安塞军和防御军也都远离幽州城。^⑤可见,藩镇时代驻扎在幽州城内的始终是经略军。

天宝时期,经略军有3万人。安史乱后的藩镇时代,经略军的人数能达到多少?这需要评估。经略军作为幽州镇首州的驻军,应该是作为战略机动的部队,所以考察其数量,应该注意幽州机动兵力的一般规模。建中四年至兴元元年(784),幽州节度使朱滔率军进入河朔南部。史载其“将范阳步骑五万人,私从者复万余人,回纥三千人,发河间而南,辎重首尾四十里”。^⑥时魏博节度使田悦已经秘密归顺朝廷,“而犹未敢绝朱滔,各称王如故”。^⑦田悦的谋士许士则说:“彼引幽陵、回纥十万之兵屯于郊垆。”^⑧而朱滔部下杨布、蔡雄劝其出战王武俊、李抱真时,也说“大王英略盖世,举燕、蓟全军,将扫河南”。^⑨此次南下,朱滔确实动员了幽州镇的绝大部分机动力量。^⑩兴元元年,朱滔与成德节度使王武俊、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之战,“滔引三万人出战,死者万余人,逃溃者亦万余人,滔才与数千人入营坚守”。^⑪

由此可见,许士则所说的10万虽系虚指,却是幽州镇的全部机动兵力,其总数应该达到6.3万人;^⑫来自幽州卢龙镇的军士应在6万。虽然损失惨重,但仅仅10年后即已恢复元气。贞元十一年(795)四月,“幽州刘济奏大破奚王啜刺等六万余众”。^⑬刘济主动出击奚王,说明10年间幽州镇经济和军事实力已然恢复。奚王如有6万之众,则在正常对阵的情况下,刘济自领的军队当亦不少于

① 参见 Stanislav Andreski,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 Berkley and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 33.

② 参见《旧唐书》卷143《刘怦传》,第3899—3900页。《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题记》中有贞元五年、六年刘济的题名,其结衔中有“经略军使”,参见陈燕珠《新编补正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以下简称《题记汇编》)第三部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台北县:觉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40页。

③ 《题记汇编》第三部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473,条1174,第170页。

④ 参见《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19—1020页。

⑤ 冯金忠认为安塞军应在蔚州东,妫州西。参见氏著《唐代河北藩镇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下注释5。

⑥ 《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二月丁卯条,第7388页。

⑦ 《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二月乙丑条,第7386页。

⑧ 《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二月乙丑条,第7387页。

⑨ 《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五月乙亥条,第7432页。

⑩ 参见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第112页。

⑪ 《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五月丙子条,第7432页。

⑫ 日野开三郎亦以幽州卢龙镇此时总兵力为6.3万,参见日野開三郎『支那中世の軍閥』三省堂,1942年,66页。

⑬ 《旧唐书》卷13《德宗本纪下》,第381页。

此数。元和五年(810),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之叛,刘济“以兵七万先诸军,斩首数千级”。^①这说明,刘济任节帅时期,幽州镇军队机动数量当已恢复至6万—7万,这应该也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幽州城内的经略军作为战略机动预备力量,应对各支州具有优势。我们似可以作如下的合理假设:经略军占当时幽州机动兵力总数的一半,则经略军仍可能保持了天宝时期3万人的规模。会昌元年(841),雄武军使张仲武从妫州前往幽州,争夺幽州节度使之位。^②他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派吴仲舒前往长安争取朝廷的支持。据李德裕和吴仲舒的对话,张仲武的雄武军只有800人,另有土团子弟500人,李德裕担心其兵少,吴仲舒还回应称“只系人心归向,若人心不从,三万人去亦无益”。^③此处举出“三万人”做比,应特指幽州城内的驻军人数。所以经略军满员的情况下,应有3万人的规模,综合考虑幽州镇几次战时大规模减员,则在大战受创之后也不应少于2万。^④所以,安史之乱后至唐末以前,幽州城内的经略军人数当在2万—3万人之间波动。

除经略军外,幽州子城内还应有衙兵。大历七年(772)秋,幽州节度使朱希彩为部下所杀,“仓卒之际,未有所从。泚营在城北,弟滔,主衙内兵,亦得众心。滔变诈多端,潜使百余人于众中大言曰:‘节度使非城北朱副使(笔者注:经略军副使)莫可。’众既无从,因共推泚,泚遂权知留后”。^⑤说明经略军驻扎在节度使的子城之北,与位于子城的衙兵分驻。驻于子城的衙兵有多少人?以下事例或可参照。元和十五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移镇成德,“以魏兵二千为卫从”,起初维持了成德镇的稳定。但因“其粮赐请给予有司”未获朝廷批准,结果于次年七月“归卒于魏州,是月二十八日夜军乱,弘正并家属、参佐、将吏等三百余口并遇害”。^⑥这说明2000衙兵可能是保证河朔强藩节度使安全的基本保证。但于幽州子城而言,2000衙兵或嫌太少。该子城内存在幽州、卢龙两个节度使府,《房山石经题记》中留下大量幽州子城内所驻衙军各种武职的记载,可知子城内衙兵的组成机构十分复杂:兵马使前往往往有“南衙”“北衙”“衙前”“使宅”等字样;^⑦还有以“院”命名者,如杨志诚为幽州节帅之前就曾任“后院副兵马使”。^⑧因此,子城内衙军人数,估为3000(官兵合计),可能是比较保守的数字。^⑨

因此,幽州城内的军人数量应该在2.3万—3.3万人之间浮动(以下为方便计算,暂取均值,亦当有2.8万人)。幽州城内这样规模的军队与城内人口的比例如何呢?首先,还是要看整个幽州镇的军队与人口的比例。前文分析的只是幽州镇的机动兵力,其军队总数应由机动兵力和边境及留守部队组成。^⑩学界通常认为,幽州镇总兵力一般情况下应不少于10万,^⑪姑且以10万计。安史之乱以后,幽州镇长期稳定地辖有幽、平、营、蓟、檀、妫、瀛、莫、涿等9州,在唐末局势动荡以前,其各州累计户数当在10万以上,^⑫折合成口数应

① 《新唐书》卷212《藩镇卢龙·刘怱附济传》,第5975页。

② 参见《旧唐书》卷180《张仲武传》,第4677页。

③ [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17《论幽州事宜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

④ 兴元元年之战,朱滔军死者1万人。即便假设死者全部为经略军,则经略军最大损失也仅为1万人,实际损失当小于此数。

⑤ 《旧唐书》卷200下《朱泚传》,第5385—5386页。

⑥ 《旧唐书》卷141《田弘正传》,第3851页。

⑦ 参见王永兴《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第267—276页。

⑧ 《旧唐书》卷180《杨志诚传》,第4675页。

⑨ 李愬讨淮西“时唐、随牙队三千人,号六院兵马,皆山南东道之精锐也”,本条胡注曰:“牙队者,节度使牙卫从之队也”。参见《资治通鉴》卷240,元和十二年五月丁丑条,第7735页。

⑩ 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第112页。

⑪ 参见王义康《唐河北藩镇时期人口问题试探》,《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冯金忠估测为10万—15万人,参见《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第112页。

⑫ 王义康对幽州镇各州户数进行过粗略估计(《唐河北藩镇时期人口问题试探》,《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10万户系笔者在其估算基础上做的保守估计。

在50万—60万。户数与军人数量比为1:1或略高,^①每6人左右就有1人参军。说明幽州镇人口的军事参与率非常之高。如此高的军事参与率,必然影响到其军粮的供应等后勤问题。因此,广泛屯田当是必然之举。^②安史之乱以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③杨志玖和张国刚据《旧唐书·洪经纶传》得出魏博的户数与军人数量(建中初年,780年前后)之比为1.1:1(即约1:0.91)。^④

幽州与魏博“休戚事同”,^⑤同号“河朔三镇”,在军事和经济基础方面也有相近之处。因此,我们可以用魏博镇的情况来作为参考。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在其十万之众中“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⑥这1万人可谓魏博节度使的核心军事力量,屯驻在魏州城内外。魏州城亦有牙城(子城)和罗城。天祐二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诛杀衙军,“时宿于牙城者千余人,迟明尽诛之,凡八千家,皆赤其族,州城为之一空”。此或系夸张之辞,但亦反映了魏州城人口的参军率十分之高,这8000衙军家庭或可能占了魏州城市户口的大部分。“时魏军二万,方与王师同围沧州,闻城中有变,乃拥大将史仁遇保于高唐,六州之内,皆为勅敌,太祖(笔者注:朱温)遣诸将分讨之,半岁方平”。^⑦“六州之内,皆为勅敌”,说明还有其他支州的军队组成。但是,这两万魏博军中肯定有不少衙军,姑且将衙军数字仍然按田承嗣时期的1万人来计,则这8000户中,每户出了1.25个军人。

《蓟门纪乱》记载上元二年(761)三月幽州城内的一次巷战:“战斗皆在坊市闾巷间。但两敌相向,不入人家剽劫一物,盖家家自有军人之故,又百姓至于妇人小童,皆闲习弓矢,以此无虞。”^⑧“家家自有军人”数语是对幽州人口军事参与率的一种形象描述,以数学语言言之,这里户数与军人数量之比应该不大于1,每户至少有1人参军。安史之乱后的藩镇时代,幽州城既然是高度军事化的城市,则这种状况应该没有太大变化。天祐三年,朱全忠自将攻沧州之时,幽州节度使刘仁恭“悉发男子十五以上为兵”,使得“卢龙闾里为空,得众二十万”。^⑨以前面分析的幽州镇人口基数做参照,则户数与军人数量比达到约1:2,这或许是唐末整个幽州镇最大的军事动员能力。唐代后期幽州城的军事参与率正常情况下应该达不到这么高,或许魏州衙军与其支撑人口之间的比例可供参考。

按照1:1.25的比率,则幽州城2.8万军人需要有2.24万户的人口规模,每户以6口人计,则藩镇时代,为幽州城内提供驻军的相应的人口总数或在13万人上下波动。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军人的招募范围,而且考虑到幽州军队屯田,这些支持军事活动的人口是否都住在城墙以内?在没有更多史料的情况下,就需要考虑幽州城的总面积和城内各主要功能区的面积来作为制约因素。

(二)以城内面积估测幽州可容纳的人口数量

研究幽州城墙以内的人口数量,首先应该考虑唐幽州城的城内面积有多大。

绝大部分学者都认可这一看法:位于今北京市区西南隅的辽南京城即是唐幽州城,并无增筑或改建。^⑩

① 《旧唐书》卷143《刘怱附子灏传》(第3901页)载,贞元十年二月,刘济弟刘灏“拔其所部兵一千五百人,男女万余口直趋京师”。显然,这万余口当多为军人家属。按每户6口计算,刘灏所带走的这部分瀛州军民中,户数与军人数量比也达到1:0.9。

② 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第111—114页。

③ 《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第3838页。

④ 杨志玖、张国刚:《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再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学术月刊》1982年第6期。

⑤ 《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第722页。

⑥ 《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第3838页。

⑦ 《旧五代史》卷14《罗绍威传》,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16页。

⑧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三月条《考异》引《蓟门纪乱》,第7111页。

⑨ 《新唐书》卷212《藩镇卢龙·刘仁恭传》,第5987页。

⑩ 侯仁之早在1949年其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中就此进行了总结(中译本参见邓辉、申雨平、毛怡译《北平历史地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176、190页)。1949年以后,学界也大多接受这一结论,就笔者所见,只有姚汉源认为辽南京在唐城基础上向东西各扩1里,但该文主要在探索度制转换,未知是否为对度制的理解不同所致,且文中并未举出辽南京对唐幽州城进行扩建的考古遗迹和文献证据。参见姚汉源《北京古城垣周长及其所用尺度考》,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0辑,北京:地质出版社1995年版,第56—62页。

幽州城大致成长方形,关于其大小,史书记载略有不同。《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称蓟城(唐幽州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①《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宋太宗时期,其所据资料显然应该是唐代的而非宋代的调查结果。学界通常认为辽南京是在唐幽州城基础上建成,因此辽南京的规模是我们考察幽州城的一个重要参照。只是关于辽南京城的大小,又有多种记载,于德源考证发现《辽史·地理志》对南京“城方三十六里”的记载与《太平寰宇记》所记最为接近,当以为是。^②因此,如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唐代幽州城面积约合今12平方千米。^③按照宿白的推算,幽州城当有16个坊的面积(以每坊0.5平方千米的标准来估算),^④则幽州城面积当为8平方千米。韩光辉认为是8.5平方千米。^⑤陈康认为唐幽州城的面积为9平方千米。^⑥鲁琪根据北京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复原了唐幽州城的四至:其东垣在烂漫胡同偏西一点,西垣在会成门村东侧一带(莲花河东岸),南墙大概在白纸坊东西街一带,北墙当在今头发胡同、受水河胡同、经白云观北一线。^⑦学界广泛接受了这一推定。^⑧2014年10月,笔者根据鲁琪提供的这些线索,携带GPS记录仪进行了部分实地考察定位。但鲁琪推定的范围仍然比较宽泛,关于幽州南墙的位置,2006年探测到的唐代古河道在白纸坊桥南大致呈东西向分布,因此幽州城墙南垣应该在白纸坊东西街以北而不会在街南。^⑨经过上述调整,则唐幽州城南北长约2.8千米,东西约3.1千米,面积约为8.7平方千米。这样的推定,因将南墙北移,与文献记载的“南北宽、东西窄”有一些不符,但是古代留下的数据的准确性本身需要验证,既然已有考古发掘,应该引以为据。笔者的估值和韩光辉、陈康估测的数据比较接近,但与前述8平方千米和12平方千米这两个值则有一些距离。唐代后期的地方城市中,在军事上同样重要、后来成为辽西京的云州城面积约3.1平方千米;^⑩唐扬州城的外罗城面积约13.1平方千米;^⑪据李孝聪实地调查指出,唐代魏州城(魏博节度使治所)原是规则的方形,节度使乐彦祯版筑罗城后向南北扩展,现存断墙残垣周长约42里。^⑫据李孝聪的绘图及比例尺,笔者估算,其原来的城面积当在8平方千米以上,加上乐彦祯增筑的部分,总面积应该在10平方千米或略过之。仿照唐长安城设计的渤海国上京城,罗城面积约15.93平方千米。^⑬设计时曾参考了幽州城的辽上京,皇城面积约在2.64平方千米,汉城面积约在2.1平方千米。^⑭幽州镇支州之一的莫州,州城面积也在约1.24平方千米,可划分为4或5个坊。^⑮相比之下,幽州城作为幽州镇的首州治所,具有8—9平方千米的面积,似应该在合理范围之内。在本文中姑且统一使用笔者的估算,幽州城面积以8.7平方千米计。

①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69《幽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99页。

② 《辽南京(燕京)城坊宫殿苑囿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4期。

③ 杨宽在《中国历代尺度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76页)中指出,唐代里数以小程小尺计者居多,如此,则1里合今约442.8米;以《太平寰宇记》所载数据,幽州城南北长合今3.985千米;东西长约3.099千米,则城内面积应为12平方千米多。

④ 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第279—285页。

⑤ 参见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第254页。

⑥ 《唐代幽州蓟城里坊、村乡之我见》,《北京文博》2006年第1期。

⑦ 《唐幽州城考》,北京史研究会编印:《北京史论文集》第2辑,第107—123页。

⑧ 董坤玉:《北京考古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2—65页。

⑨ 岳升阳、苗水:《北京城南的唐代古河道》,《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⑩ 丁晓雷在《大同旧城的形制布局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委员会编:《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187页)一文中指出:今之大同旧城即唐云州城之原址、范围和规模,亦即辽西京大同府之规模。其东西长1750米,南北宽1810米。据此,唐云州城的城内面积约3.1平方千米。

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⑫ 《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李孝聪主编:《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第100—102页。

⑬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渤海上京城》(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⑭ 李作智:《论辽上京城的形制》,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134页。

⑮ 参见李孝聪《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李孝聪主编:《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第82—83页。

下面还必须再分别统计幽州城内各个功能区的面积和人口。

1. 幽州城的子城。幽州城由子城和罗城组成,子城面积可以估测。唐幽州节度使子城,即后来辽燕京之皇城,辽人也未增建。^①子城位于幽州城西南隅,子城内三隅与外城城墙相接,只有东北隅独立,故设有一角楼,称燕角楼,位置在今广安门内大街与南线阁路交汇处,目前已设立故址纪念碑(北纬 $39^{\circ}53'16.37''$,东经 $116^{\circ}20'50.42''$)。由此,则子城面积大致可求。笔者经GPS定位、百度地图测距,计算得出其面积约1.82平方千米。^②子城内的衙军官兵数量估算已见前文,按唐朝户籍制度,节度使府僚佐应注册于州县乡里,为避免重复计算,不与一般的城市居民中割裂开来。^③负责节度使日常生活的奴婢,其数量不详,且因为没有合适材料,连同节度使家族成员一起,暂不作估算,这样后面得出的人口总量也必然是较为保守的数字,我们且用这个保守数字来进行前后比较,或许更能观察幽州城人口发展趋势。

由此,则幽州罗城总面积约为: $8.7 - 1.82 = 6.88$ 平方千米,应由街道、幽州市和军民居住的坊三部分组成。

2. 幽州市的面积与人口。幽州市面积有多少?在没有直接材料的情况下,我们仍需参照唐代长安的市内面积来进行估算。《长安志》记载,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④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⑤东西二市呈对称分布,各占两坊之地。西市经考古钻探,面积约为0.95平方千米,东市亦有0.92平方千米。^⑥黄正建将东市市墙、内部“井”字型街道、放生池、沿围墙街道、水渠和渠岸、街道两侧水沟以及东市局、平准局、市署、常平仓等官署机构都作为应予以刨除的面积,估计东市内能住人开店的面积不足50万平方米。^⑦对于放生池的面积,黄正建估计为4万平方米,^⑧据考古发掘,其池址为近椭圆形。若依椭圆形计算,其面积约为2.4万平方米,^⑨放生池东南80米还有一小椭圆形放生池,连同渠道,估测面积在0.5万平方米以下。考虑到黄正建所说的一些必须空置的空间,能够住人开店的面积估计不会小于50万平方米,暂仍以50万平方米计。东市能容纳多少人家,虽尚待研究,^⑩但可知220行占地面积约达50万平方米,约占东市总面积的54%。

唐幽州城的市位于城内北部。^⑪直到契丹占领幽州之时,仍然沿袭其旧,故《辽史》曰:“城北有市,百物山侔”。^⑫《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191条488的题记称:“范阳郡市东店侯光进、母杜、妻任、

① 鲁琪:《唐幽州城考》,北京史研究会编:《北京史论文集》第2辑,第115—116页。

② 王世仁则根据先秦文献和《乘积录》等文献考证,唐、辽子城即是蓟丘,面积与周制1丘面积相合,当为 $1400\text{米} \times 1400\text{米} = 1.96$ 平方千米。参见《蓟丘别议》,《北京规划建设》2016年第4期。

③ 参见王社教《论唐都长安的人口数量》,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第97页。

④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8《东市》,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1页。

⑤ 宋敏求:《长安志》卷10《西市》,第337页。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

⑦ 《书评:〈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3卷,第502—504页。

⑧ 《书评:〈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3卷,第502—504页。

⑨ 其东西直径180余米,南北直径160米,岸宽3米,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 π 取3.14,计算求得。

⑩ 日僧圆仁记录会昌三年六月廿七日,长安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严耕望据此得出东市应有七万二千数百家,至少也有5万家(参见《唐代长安人口数量之估测》,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印:《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印行,第13—14页)。但小野胜年及白化文等注释者以为“千”为“十”之误([日]圆仁著,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4,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25—426页)。黄正建对严耕望的东市人口估算数表示怀疑(参见《书评:〈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3卷,第503—504页),按照其户均30平方米(每户4人)的估算,50万平方米、220行应能居住约16667家,合66700多人,则每行平均约有30人。2016年11月19日,笔者与黄正建研究员谈及此问题时,他表示当时并未考虑到东市内是否有高层建筑。

⑪ 赵其昌:《辽代燕京之显忠坊、檀州街与市》,首都博物馆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印:《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辑,1982年印行,第11—14页。赵其昌还特别强调,对于“城北有市”应该理解成是城内的北部。

⑫ 《辽史》卷60《食货志下》,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031页。

弟光庭、妻卢、弟光晖、弟希倩、男万德，合家供养”。^①幽州于天宝元年(742)改“范阳郡”，乾元元年(758)复为幽州。^②结合前后有纪年的其他题记，这条题记反映的应该是天宝年间(742—755)幽州市的情况。据日野开三郎的研究，唐代邸店的含义十分广泛，经营业务有餐饮、仓储、住宿等，但是从长安市和洛阳市的情况来看，行、肆与邸、店对举，似乎更倾向于指代仓库或旅舍。^③邸店的命名也有一定规律，一般是“姓氏+店”，即“某家店”，或者是以营业地点的位置来命名。^④上述题记中的“店”似也应该作邸店来解，既然称东店，幽州市内似乎还应至少有一西店与其对应。幽州市内有行。从天宝到贞元年间，幽州市先后出现的行有23个。^⑤《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大顺二年(891)六月乙酉，幽州市楼灾，延及数百步。”^⑥市楼往往是管理市场的处所，位于市中心。而在中晚唐时代，幽州节度使往往也安排僚佐来负责市场的管理。大和二年(828)四月八日题刻的《金刚三昧经》题名中有“将仕郎、前守幽州蓟县尉、摄府市令陈玄堂”。^⑦这里的“府”应指幽州大都督府。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大都督府下设市令1人，从九品上，其“掌市廛交易、禁斥非违之事”。^⑧由此看来，幽州市的结构很可能与长安、洛阳相类，亦由经营某一类商品的行、邸店，以及位于市中心的“市楼”组成。因此，参考长安东市诸行占地面积(220行，约55万平方米)，则幽州市23行占地面积约为5.22万平方米，保守假设幽州市诸行占地面积占到整个市面积的50%，则幽州市面积约可估为10万平方米(0.1平方千米)。居住在幽州市的人口有多少？《房山石经题记》中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366条875题记载，幽州市诸行“合邑一百一十七人等同造石经一条，贞元十一年四月八日建”。^⑨若据此认为幽州市诸行商户可能在120户左右，则这里暂且将幽州市内常住商户人口估为700人。^⑩

3. 幽州罗城街道的面积。汉长安城内8条主要街道约1.13175平方千米，^⑪而汉代长安城面积为36平方千米，^⑫则街道占城内面积约2.8%；唐长安外罗城的街道(不含坊内和东西两市内)已勘测出南北向11条道路和东西向10条道路(北起第四至第十三街)，粗略估算其总面积，就已超过12平方千米(含街道两侧水沟)，^⑬约占唐长安城总面积的14.2%以上，若加上未勘测街道，则街道总面积会更大。扬州城罗城内有南北向路6条，东西向路14条，其中南北干道3条，东西干道4条，道路宽5—10米，并有南北向中心斜街。^⑭粗略估算，道路总面积0.52平方千米，约占扬州城面积的4%

① 《题记汇编》，第128页。

② 《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河北道》，第1515页。

③ 参见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の研究』1968年自版，1—13页。

④ 参见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の研究』，111页。

⑤ 据唐耕耦《房山石经题记中的唐代社邑》(《文献》1989年第1期)统计，不考虑其出现的时间，从天宝至贞元年间，先后出现的行名有23个。另于德源、富丽《北京城市发展史(先秦—辽金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列有26个行名，但所列行名中似有涿州的市行。

⑥ 《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一》，第887页。

⑦ 《题记汇编》，第83页。

⑧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916、1920页。

⑨ 《题记汇编》，第146页。

⑩ 依据黄正建对长安东市的估测(假设没有高层建筑)，每行约有30人，那么幽州市有23行，依此推算，则常住在幽州市的商人700人，或可以接受。

⑪ 孟凡人：《汉长安城形制布局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委员会编：《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第58页。

⑫ 王仲殊：《西汉的都城(长安)》，收入氏著：《汉代考古学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页。

⑬ 以上各条道路总面积的基础数据(长、宽以及两侧水沟宽度)，均来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

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59、65页。

左右。渤海上京城,已探知街道9条,累计面积达2平方千米以上,^①至少可占上京城总面积的12.6%。据目前可考,幽州城已知有檀州街,^②经略军南街、燕州街,^③子城北门前亦当有横街,悯忠寺“门临康衢”。^④因此,可以想见唐幽州城内宽阔的街道纵横交错。综合参照上述这些城市的街道情况(长安城和上京城是都城,因此街道占全城面积比例偏高,似以扬州作为参照比较合适,同时考虑到扬州城中尚有24桥以及南北向纵贯城内的河道2条),暂且估算幽州城的街道占城区总面积的5%,则幽州城街道面积可能约为0.435平方千米。

4. 经略军的驻地面积。经略军的营盘面积只能根据一些量化指标来进行推测。英国派驻南非纳塔尔地区(Natal)的主教科伦索(John William Colenso)曾经使用简单量化的方法对《旧约全书》中所提到的摩西率领的犹太人的人数进行了考证。他先算出成人棺槨的大小,约为1.8米×0.6米,然后3倍之,得出成人至少需要3.25平方米的生存空间。^⑤据孙大章研究,传统民居,“开间一丈,进深一丈六尺的间架,可获得约16m²的标准间的空间体量”,可以满足安排家具及日常活动需要,^⑥如果每间住5人,则每人的活动空间应在3平方米多。宋代实行募兵制,家属随军。程民生考察,营房一般是每人(即每家)1至2间;而北宋太学每斋5间,住学生30人,每间平均6人。^⑦由此可见,科伦索的假设,基本适用于分析人员居住紧凑的兵营营房(或学校校舍)面积。前文已经分析了经略军满员时的规模是3万人,则经略军驻地营盘最小面积约为0.1平方千米;如果考虑到正常生活(如放置军械、屯储粮食、吃饭、如厕等)的需要,实际面积应该约为0.45平方千米,^⑧大致相当于长安城朱雀门街东第三至五列坊中的一坊之地。又经略军尚有马5400匹。^⑨据《唐米文辩墓志》载,魏州城内魏博节度使府西有征马坊、驼坊、骡坊,^⑩推测幽州城内亦有相应的处所来饲养、管理经略军的马匹。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马厩坑,一般面积约3平方米左右(葬有1马),^⑪养1匹马的最小活动空间若以此面积的3倍来计,则需要9平方米的空间。^⑫5400匹战马,则其厩舍面积约0.05平方千米,如是供经略军使用,则应在罗城而非子城内。

5. 幽州城的寺观及其人口。幽州城内有很多寺院,敦煌文书S.529《佚名行记》(亦称《诸山圣迹志》)记载,唐末五代时期,^⑬幽州有“大寺一十八所,禅院五十余所,僧尼一万余人,并有常住,四事丰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② 赵其昌:《辽代燕京之显忠坊、檀州街与市》,首都博物馆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印:《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辑,1982年印行,第11—14页;张天虹:《中晚唐幽州城的“檀州街”——从〈房山石经题记〉说起》,房山石经博物馆、房山石经与云居寺文化研究中心编:《石经研究》第1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版,第178—184页。

③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三月条《考异》引《蓟门纪乱》,第7112页。

④ 沙门南:《重藏舍利记》(892年建),《释》一诚编:《法源寺贞石图录》,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⑤ 参见高峰枫《科伦索主教与摩西五经》,《读书》2012年第8期。

⑥ 《中国民居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

⑦ 《宋代房价与住房面积考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4—177页。

⑧ 曾有学者分析,200万人需要30平方千米,才能保证正常生活和活动,参见高峰枫《科伦索主教与摩西五经》,《读书》2012年第8期。姑且以此试推。

⑨ 参见《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第1387页。

⑩ 参见孙继民等《新出唐米文辩墓志铭试释》(原载《文物》2004年第2期),收入孙继民主编:《河北新发现石刻题记与隋唐史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⑪ 参见赵康民《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五座马厩坑》,《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⑫ 据笔者在网上查阅相关资料,亦见马厩最小也要3米×3米的空间,以保证马的转身和通风良好。参见《城里人,如何养一匹马》,http://www.chinahorselover.com/newhorse.html,2016年10月15日。

⑬ 郑炳林考证,该行记作于后唐,参见《论〈诸山圣迹志〉的成书年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期。

盈”。^①作为讨论唐代寺院分布的资料,《失名行记》的价值近年来曾遭受质疑,^②它确有记载失实的夸张之处,但该行记记载河朔事甚详,或可得到正史佐证。^③郑炳林判断其作者对河朔地区最为了解,^④当是事实。因此,《失名行记》对我们了解藩镇时期幽州城的寺院情况,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据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和《析津志辑佚》,若以大中末年至唐末(859—907)为断限,则幽州城内见诸上述两书的寺15所,禅院3所,观1所。^⑤安史之乱以后,军中佛教活动非常盛行:“岷峨之人,酷好释氏,军中皆右执凶器,左秉佛书,诵习之声,混于刁斗”,^⑥虽然这是描写唐末五代蜀中的情况,但这种场景亦见于中晚唐的幽州城内。自节度使而下幽州军人的崇佛盛况,《房山石经题记》可为明证。^⑦在这种背景下,有大量僧人“北游”到幽州。柳宗元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指出:“今燕、魏、赵、代之间,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缘饰政令,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⑧会昌灭佛期间(841—845),按照圆仁的记载,“唯黄河已北镇、幽、魏、路(笔者注: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拆[寺]舍,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⑨虽然学者们认为圆仁的记载可能是传闻,也找到了会昌灭佛在幽州实施的证据。^⑩但一个重要事实是:幽州节度使张仲武起初对灭佛措施执行不力,进而导致“五台僧多亡奔幽州”。以至会昌五年,李德裕给他下了严令:“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张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关曰:‘有游僧入境则斩之’”。^⑪由此看来,会昌灭佛期间,幽州实为僧人避难所,只是在朝廷的高压之下,节度使张仲武才断绝了僧人的逃归之路。由此可知,朝廷严令下达之前的幽州城很可能已经聚集了大量僧人。会昌灭佛运动一结束,幽州便再次回归为佛教的中心,这里的佛教活动更加兴盛了。又据张弓研究,幽州所在的河北道乃是唐代佛寺分布的次密区;^⑫冯金忠的统计则表明,在整个河朔,尤其是到了藩镇时代,已经形成了“以幽州为中心的佛教寺院密集区”。^⑬联系上述背景,《失名行记》对幽州寺院、僧尼的记载并非言过其实,应该可反映中晚唐以来幽州城佛教兴盛的局面。如果把侍者、净人、奴婢等寺观依附人口都考虑进来,中晚唐幽州城有“僧尼一万余人”即便被认为有所夸张,但将“一万余人”考虑为宽泛的城内“寺观人口”,^⑭还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我们可以接受《失名行记》对幽州城寺、院的记载,那么其占地面积需要分别来进行估算。宿白将长安佛寺按面积分成了5个等级:有尽一坊之地(第一等级)、半坊之地或略强(第二等级)、

①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② 张伟然、聂顺新:《也谈唐代佛教寺院分布的辑补——兼析敦煌文书〈诸山圣迹志〉的史料价值》,《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2期。

③ 关于此文书中所载河朔事,拟另文讨论。

④ 郑炳林、陈双印:《敦煌写本〈诸山圣迹志〉作者探微》,《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

⑤ 参见[清]缪荃孙辑《顺天府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4页;[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7—94页。黄春和亦考证了幽州城区隋唐寺庙17所,但所据资料略有不同,参见《隋唐幽州城区佛寺考》,《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

⑥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38《李延召》引《玉堂闲话》,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837页。

⑦ 参见刘琴丽《唐代幽州军人与佛教——以〈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6期。

⑧ [唐]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25《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67页。

⑨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4,会昌五年十一月三日条,第496页。

⑩ 参见方广钊《中华文化通志·佛教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

⑪ 《资治通鉴》卷248,会昌五年八月壬午条,第8018—8019页。

⑫ 参见张弓《唐代佛寺群系的形成及其布局特点》,《文物》1993年第10期。

⑬ 冯金忠以今天的河北省和北京市、天津市作为统计的地域范围,但是基本上涵盖了安史之乱以后河朔主要藩镇的中心城市,如魏州、真定、定州、幽州等。参见《燕赵佛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0—95页。因此,可以据其统计结果得出上述结论。

⑭ “寺观人口”(“寺观人户”)比“僧尼”“道士”的概念宽泛,还应包括依附人口。参见严耕望《唐代长安人口数量之估测》,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第7—9页;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2卷《隋唐五代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109页。

1/4坊地(第三等级)、1/16坊地(第四等级)以及面积低于第四等级的寺院、兰若等。^①长安以外的地方寺院规模该如何参照长安寺院的面积来进行估算?日僧圆仁在会昌灭佛期间这样写道:“长安城里坊内佛堂三百余所……一个佛堂院敌外州大寺”,^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但仍需具体分析。^③幽州城的大寺18所,悯忠寺为唐太宗时所敕建,会昌灭佛期间予以保留,可知其在幽州甚至整个河朔地区的重要地位。建筑史专家傅熹年根据法源寺碑刻的记载以及可能为唐代的两根柱础,对照今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辽代遗存)形制,绘制了唐景福年间(892—893)悯忠寺想象复原图,并推测“现在的法源寺范围可能只是唐、辽时悯忠寺中路三门以北的部分”。^④法源寺现存面积6400平方米。^⑤“悯忠寺”额前加“大”字,是在辽咸雍六年(1070)以后,^⑥而长安的寺额署“大”字者为前一二等级,^⑦所以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悯忠寺或可参照长安第四等级寺院,面积估为3万平方米(0.03平方千米)左右。而其他17寺规模可能要小,约略估算为平均每寺1万平方米(天长观亦姑且参考之)^⑧。禅院面积更小,以寺面积1/10记,则幽州城寺观累计占地约0.25平方千米。

6. 幽州罗城的各种官方机构和隙地。幽州罗城里还有一些官方机构。《旧唐书·地理志》载,幽都县“与蓟分理。建中二年,取罗城内废燕州廨署,置幽都县,在府北一里”。^⑨这里的“府”,应是指幽州大都督府。由于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幽州刺史按例都是由幽州卢龙节度使兼任,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幽州大都督府廨与节度使衙、幽州州衙都位于子城内;幽都县廨与蓟县县廨则都位于罗城之内。长安城的万年县廨在宣阳坊东南隅;长安县廨在长寿坊西南隅。^⑩按照这两坊的建筑密度,“隅”当指1/16坊之地,故而推测,万年县和长安县廨的占地面积均在3万平方米以上。幽都县廨和蓟县县廨该如何参照长安城的这两处县廨?河南内乡县衙,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县级衙署,为清代遗存,占地面积尚达2万平方米。^⑪因此推测幽都县和蓟县县廨占地面积亦当在2万—3万平方米之间。藩镇时代幽州罗城内尚有官营的“作坊”^⑫“冶坊”^⑬,或与供应军需的各种手工业生产有关;还有负责漕运事宜的“船坊”。^⑭此外,还有“蓟门馆”接待奚、契丹等部落使者的馆驿等以及原有羁縻州废置的官廨。将各种官方机构以及可能存在的各种“隙地”估为1平方千米,则供居民居住的面积应在4.5平方千米以上(即 $6.88-0.1-0.435-0.45-0.05-0.25-1=4.595$)。这里对于各种非居民居住区的面积估算可能会偏高,但对功能性区域从高估算,只会使人口密度更加“稀释”,从而使得得出的人口总量应是低值而非高值。

7. 幽州罗城内居民区及其人口。从出土墓志来看,幽州城内当有不少节度使府官员的宅第,但

① 参见宿白:《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文物》2009年第1期。

②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4,会昌四年七月十五日条,第446页。

③ 参见宿白:《唐代长安以外佛教寺院的布局与等级初稿》,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283页。

④ 傅熹年:《北京法源寺的建筑》,收入氏著:《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267页。

⑤ 赵迅:《古刹悯忠话沧桑》,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8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⑥ 参见傅熹年:《北京法源寺的建筑》,收入氏著:《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第265页。

⑦ 宿白:《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文物》2009年第1期。

⑧ 宿白提示大同善化寺的范围除主院外,还保留了左右侧院的大部分面积,可以作为研讨唐代州级开元寺遗迹的参考。参见《唐代长安以外佛教寺院的布局与等级初稿》,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第284页注释18。根据梁思成、刘敦桢《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图版一五”(《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3、4期合刊本,1933—1934年)比例尺粗略估算,善化寺面积在8000平方米以上。

⑨ 《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第1516页。

⑩ 宋敏求:《长安志》卷10《长寿坊》,第278、338页。

⑪ 刘炜、阮健:《河南内乡县衙研究》,《华中建筑》2014年第10期。

⑫ 《题记汇编》,第82、173页。据题记中的结衔,这些“作坊”往往由节度使麾下的将佐领作坊使,且这些作坊似有东、西之分。

⑬ 《题记汇编》,第95页。

⑭ [唐]许胜:《唐故卢龙节度衙前兵马使兼知船坊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上柱国陇西董府君(唐元)墓志铭并序》,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239页。

并非同时并存,尚难以统计,因此下面只能以平均居住面积来进行估测。据孟凡人研究,北魏洛阳城,洛河以北每户占577.4平方米,而洛河以南每户占476.7平方米。^①黄正建结合文书资料与文献记载,提出“唐代一般民众如果有宅院的话,其宅院面积在150—2000平方千米之间”,^②给出了唐代民众宅院的区间值;并重点考察了唐宋之际敦煌民众的住房面积:1户人家如有1亩园宅地,住宅院落和园地总计面积应该在500平方米左右。^③王社教则以长安每户占地500平方米为基准,其依据在于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的规定。^④看来,户均占地500平方米,或可能是比较普遍的情况。以此推算,幽州城居住区有超过9000户,平均每户以6口人计,当有5.4万人。以幽州军事参与率回推出来的是支撑2.8万人军队规模的军事活动人口,他们未必都居住在幽州城内(但军人则要留在城内)。幽州城“家家自有军人”,参照1:1.25的军事参与率,5.4万人口尚含有军人1.1万。这部分人,不能够在2.8万军人中重复计算,因此还需要列入幽州城统计范围的衙军和经略军应有约1.7万人(其家属不住城内)。

将以上藩镇军民、商人和寺观人口三部分合计,在藩镇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幽州的常住人口数量应在8万(即 $5.4+1.7+1+0.07=8.17$)上下。

四、上述蠡测的一些佐证

藩镇统治下的幽州城,人口达到8万多人。由于有些资料无法掌握,因此前面估算的人口数从低不从高;估算相应的空间则就高不就低,有些人口(如奴婢的数量),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未予算入,因此,目前这个数字应该是非常保守的估计。但即便如此,若依高寿仙对天宝年间幽州城9万人口的估算,则可知幽州城市人口在藩镇统治下并未有太多削减。这是否符合事实?由此则涉及到一个问题:对藩镇统治下幽州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应该如何评估?

首先,安史之乱以后,幽州卢龙节度使割据一方,虽然也和唐廷发生过冲突,但自节度使刘济以后至唐末的很长一段时间,幽州镇往往表现出对唐廷“恭顺”的特点。^⑤唐廷方面也逐渐认识到“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假以节旄,必自陈力,不足以逆顺治之”,^⑥对那里的节度使立废之事,不再试图强加干预,而是更乐于因循“河朔故事”。而受到“河朔故事”激励的幽州卢龙节度使,“擅地务自安,郾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⑦所以东北边疆局势实较安史之乱以前安定。^⑧而幽州城内的军乱频繁,但大都局限于争夺节度使之位,持续时间并不长,几乎没有再出现上元二年那种战斗皆在坊巷间的局面。传统的农业经济受到自然环境以及战争影响而出现颓败现象,是时常有的。但是一旦局势稳定,环境好转,加上休养生息的政策,则恢复起来亦非难事。

太平兴国六年(983),田锡给宋太宗的上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使河朔之民得务三农之业,不出五载,可积十年之储。”^⑨其上书的重要背景是河朔地区经过宋辽几次大战,经济残破。

① 《汉长安城形制布局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委员会编:《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第48—56页。

② 黄正建:《唐朝人住房面积小考》(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收入氏著:《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149页。

③ 黄正建:《敦煌文书所见唐宋之际敦煌民众住房面积考略》(原载季羨林等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收入氏著:《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第152—165页。

④ 王社教:《论唐都长安人口的数量》,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第88—116页。

⑤ 参见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第213—220页。

⑥ 《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第4471页。

⑦ 《新唐书》卷219《契丹传》,第6172页。

⑧ 王滨生:《关于唐五代幽州割据的几个问题》,首都博物馆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印:《首都博物馆丛刊》第2辑,1983年印行,第25—32页。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壬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98页。

安史之乱后,包括幽州在内的河朔三镇所面临的形势与此庶几类似。经过战火蹂躏的河朔藩镇,节度使普遍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其战争机器提供有力的经济保障。所以,在这一时期与河朔藩镇节度使有关的各类碑刻中往往都有农业发展、人口恢复的记述。^①而幽州节度使对朝廷也往往多有“贡献”,^②从而表明幽州镇治下的经济依然繁荣。如果幽州的社会经济水平没有倒退,甚至有所发展,则很难想象幽州城的人口会大量减少。

其次,藩镇统治下的幽州城虽有人口迁出,但同时也流入和补充了大量人口,成为幽州城的常住人口。长安、洛阳是流动人口的目的城市,地处东北边疆的幽州正是地方性的人口流动目的地。宁欣、李凤先曾经重点研究了唐前期和安史之乱期间幽州地区的人口流动,并指出安史之乱后北方及东北民族的南下,引起中原北部和河北地区民族结构的再次调整,认为这种流动“决定了此后数百年中国北方偏东北地区的政治和民族格局的新局面”。^③陈述也已指出,唐后期朝廷的河朔政策,使得幽蓟地区胡汉交融。^④吸收东北少数民族的人口,当是幽州城的最重要的人口补充。

陈寅恪很早就指出了安史之乱后士人北走河朔的问题,并指出这是“当日社会之常情,而非变态”,^⑤其所举两例中的李益,即是被幽州刘济辟为从事。由于辟署制度的盛行,文武人才来幽州谋职的事例很多,可见表1。

表1 因政治动因流入幽州城的人物表

人物	迁移时间	迁出地点	出任官职	资料来源
彭浣	大历八年至九年	恒州	节度使食客 ¹	建中016
杨麟	约大历、建中年间(与彭浣有交游)	弘农华阴	蓟县尉	《新中国·北京壹》22
蔡雄	约大历间	贝州	幽州卢龙节度押牙	续贞元074
谭忠	元和五年前	绛州	军将	《樊川文集》卷6《燕将录》
华封舆	约元和间	高唐	幽州户曹掾	《新中国·北京壹》29
周玅	元和中	河中一带	散兵马使	续大中056
论博言	大和	咸镐	幽州节度散兵马使	《补遗》第7辑《论博言墓志》
姚季仙	会昌中	不详	节度驱使官	续咸通025

说明:该表选择人物的标准是明确记载有幽州城内活动的人。资料来源一律简写,只记最终出处;墓志类书只记载编号,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及其续集,仅注明编号,续集则在编号前标明“续”字;《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XX,表示此行信息出自《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第XX号;《全唐文补遗》简称作《补遗》。具体考证容另文讨论。

注:1. 后出任“瀛州景城县主簿”。

唐末五代幽州人口往往被契丹俘掠出境,^⑥或主动逃往契丹与河东避难。这是事实。但有两点:一是时间上主要集中在唐末刘仁恭时期;二是陈述很早就指出,不得志的长安士大夫逃入包括幽蓟地区在内的河北特区(从其举例来看主要是幽蓟地区的事例),在此特区的人们又亡入契丹,由此形成波浪式的连锁影响。^⑦由此可见,藩镇统治下的幽州城,在唐末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人口至少是有进有出的。

复次,幽州城作为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涿州范阳县宣王庙之碑》记载,贞元五年幽州镇治下的涿州“领户万,流庸附占者如之”。^⑧幽州城的流庸附占者也应不

① 参见[唐]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915,第4816页;[唐]程浩《相州公宴堂记》,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806,第4261页。

② 参见《旧唐书》卷143《刘济传》,第3900页;《旧唐书》卷180《张允伸传》,第4679页等。

③ 《试析唐代以幽州为中心地区人口流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④ 《契丹政治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0—94页。

⑤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

⑥ 高寿仙:《北京人口史》第133页。

⑦ 参见《契丹政治史稿》,第94—98页。

⑧ 杨卫东等编:《涿州贞石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少,而且幽州城还有非常住的流动人口(未列入前面的统计之中),应包括:

1. 东北少数民族遣唐使团和商人。唐朝后期,奚、契丹等“每岁朝贺,常各遣数百人至幽州,则选其酋渠三五十人赴阙,……余皆驻而馆之,率为常也。”^①这说明有大量使者留在幽州待命,成为幽州的常规性流动人口,每年当有数百。此外,幽州与渤海国有使节往来。张建章作为幽州的使者(或送使)曾于大和七年至九年出使渤海国,回到幽州后写下《渤海国记》。^②村井恭子指出,张建章从海路前往渤海国,幽州通过陆海两路与周边少数民族交往,而周边少数民族亦把幽州作为唐朝的窗口。^③这种使者的往来非常频繁,构成了非常住但有规律性的流动人口。而且大批不能前往长安而留驻在幽州的使者还可能从事交换活动。中晚唐时代,随着茶叶等大宗商品长途贸易的蓬勃兴起,河朔强藩为筹措军费或谋私利,甚至直接开设邸店,从中收获巨利。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令民间用泥泥为钱。又禁江南茶商无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为茶,鬻之”。^④显然,在此之前,应该有很多从事长途贸易的行商进入幽州城。

2. 前来巡礼的僧人和信众。从《房山石经题记》可以看到以石经山云居寺为中心的巡礼、刻经等活动涉及地域非常广泛,从而形成一种往返式的人口流动。^⑤气贺泽保规的研究甚至揭示了唐中后期存在一个以云居寺为中心、最大半径达125千米的巡礼(信仰)圈。^⑥幽州城内佛寺众多,这些信众和僧人也可能要到幽州城内停留,尤其是那些自北部而来的信众和僧人必然要经过幽州城,从而构成幽州城的非常住性流动人口。

此外,还有幽州镇各支州官员迁转、改任而形成的向幽州城的暂时性人口流动,此问题牵涉面较广,拟另文探讨。总之,在藩镇统治的大部分时期(763—907),幽州的社会经济水平不但没有衰退,反而可能有所增长,而幽州城也在进一步成长为唐帝国东北边疆区域性政治、军事和经济甚至是文化中心,可以产生一定的人口集聚效应。

五、结语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以后至唐末动乱以前,藩镇统治下的幽州城,一般有常住人口8万多人。以幽州城8.7平方千米的面积估算,人口密度近9200人/平方千米。几乎同时代的上京城,宋国忱估计其城市人口盛时在15万—20万左右,^⑦人口密度约9400—12500人/平方千米,上京为渤海都城,人口密度自然更大一些。据高寿仙研究,辽天庆三年(1113)燕京城内人口数117000人,人口密度达到13000人/平方千米、金泰和七年(1207)中都人口密度达到18605人/平方千米、元至元六年(1340)大都人口达到13986人/平方千米。^⑧甘博在20世纪初的调查显示,北京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英里33626人,合约13000多人/平方千米,而且当时的北京仍然是“一个到处是平房的城市”。^⑨唐幽州城(辽燕京城)故址都在今西城区(合并后的西城区)范围内,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西城区常住人口密度约24605人/平方千米;加上常住外来流动人口后的总人口密度约31071人/平

① 《旧唐书》卷199下《奚传》,第5356页。

② 参见赵其昌《〈张建章墓志〉续考》,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8辑,第15—30页。

③ 《唐代边境防卫城市幽州》,杨振红、井上彻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第171页。

④ 《资治通鉴》卷266,后梁开平元年三月条,第8671页。

⑤ 参见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第54—66页。

⑥ 气贺泽保规「唐代幽州の地域と社会——房山石经题记を手がかりとして」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の歴史的研究』,157—166页。

⑦ 《渤海上京城的“市”与市易媒介和人口问题》,郑永振、李东辉、尹铎哲主编:《渤海史研究》第12册,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247页。

⑧ 参见《北京人口史》,第212页表3—13。在计算辽燕京城人口密度时,高寿仙使用的是陈康估算的唐幽州城面积(9平方千米)。

⑨ [美]西德尼·D.甘博著,陈愉乘、邢文军等译:《北京的社会调查》,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83页。

方千米。^①综合参考上述数据,我们对唐藩镇统治时期的幽州城人口数量估值,当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且可能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如果再考虑流动人口和未能加以估算的奴婢等人群的数量,藩镇统治下的幽州城盛时人口达到甚至超过10万人,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安史之乱以后,藩镇统治下的幽州城,已经成为唐朝东北边疆的一个重要中心城市。无论在北京人口史还是城市发展史上,藩镇时代都不是一个低谷,而是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A Test Study on the Population Quantity of Youzhou City under the Reign of Military Governorship during the Tang Dynasty(763 – 907)

Zhang Tianhong

Abstract: The City of Youzhou was the centre of the Youzhou military governorship, which was located on the northeast borderland in the Tang Dynasty. We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size and the makeup of its population. The city of Youzhou was a highly militarized city, under the reign of military governorship. It was to be clear that soldiers and their family dependents were the main part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when we estimated the quantity of the population. Also, we should take the followings into account: the area inside the city and the quantity of other groups except the soldiers which the relevant functional zones can hold. There was a permanent resident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80 000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end of Anlushan Rebellion to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763 – 907). During this period, the economy of Youzhou had recovered. The city of Youzhou was, in military,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growing into the regional central city of the northeast borderland in the Tang Empire. Then there came about population gathering there. This figure could be in reasonable scope, with the reference to these backgrounds and later data. It was not impossible that there was a population of 100 000 or more in the city of Youzhou during the summit of the mediate and late Tang Dynasty. Whatever in the history of Beijing population or the history of its urban development, the era of military governorship was not a bottom but a very important stage.

Key Words: Tang Dynasty; Military Governorship; City of Youzhou; Population

(责任编辑:丰若非)

^① 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编《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11》表2—1、2—9(<http://www.bjstats.gov.cn/nj/qxnj/2011/system/main.htm>,2017年7月22日)计算得出。